

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

潘莉 黄希庭 李树杰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价值观是人们区分好坏、善恶、美丑、损益、是非的信念系统,通常是充满情感的。价值观具有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特点。价值观的稳定性表现为:基本价值观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特别是保护性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个人的发展、经历重大事件以及实验干预可导致价值观的改变,可变性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重要性发生变化。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讨个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以及价值观研究中国化、价值观研究对价值观教育的启示,乃是我们今后研究的关注点。

关键词:价值观;稳定性;可变性;价值观研究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1)01-0058-06

1 引言

价值观是人区分好坏、善恶、美丑、损益、是非的信念系统,通常是充满情感的(黄希庭,2014)。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价值观之间具有层次性,有的是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有的是非核心价值观(Non-core Value)。此外,价值观不仅仅是个人的特征,同时也是群体的特征,并且具有社会历史属性,个人的价值观必然打上历史和文化的烙印。对社会而言,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且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价值观即是正确的价值观,而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价值观为错误的或扭曲了的价值观。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当中涉及许多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

2 价值观的稳定性

目前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研究大多来自国外,并且主要是基于Schwartz的价值观理论。Schwartz(1992)提出了10种基本价值观(Basic values):分别是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安全(Security)、遵从(Conformity)、传统(Tradition)、仁慈(Benevolence)、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自我定向(Self-Direction)、刺激(Stimulation)、享乐(Hedonism)。这些价值观可以分为4种高阶价值观类型,即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保守性(Conservation)、开放性(Openness to Change)。因此,价值观稳定性与可变性主要是对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探讨。目前,研究

者们开发了许多价值观测量工具。其中最常用的有Rokeach价值观调查表(Rokeach Value Survey, RVS, Rokeach, 1973);Schwartz价值观调查表(Schwartz Value Survey, SVS, Schwartz, 1992);Schwartz肖像价值观问卷(The Portrait Values Questionnaire, PVQ, Schwartz, 2001)。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稳定性是价值观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Schwartz(1992)将价值观定义为跨越情境的目标,体现价值观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纵向研究结果证实了基本价值观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特别是保护性价值观(Protected Values)以及人生价值观(Life Values)等具有稳定性特征。

2.1 基本价值观的稳定性

基本价值观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Bardi & Goodwin, 2011)。跨时间的稳定性主要出现在成年群体中;表现为对一些价值观重要性的评价无变化以及价值观等级排序保持不变。

2.1.1 跨时间的稳定性

价值观跨时间的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的重要性保持稳定,即个体几次测试的某一具体价值观在量表中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Bardi等(2009)对一批大学生进行了一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仅权力价值观和仁慈价值观的重要性发生改变。Vecchione等(2016)通过长达8年的价值观追踪研究发现,刺激、自我定向、享乐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保持稳定。二是个体内部价值结构保持稳定,即对多种价值观重要性排序没有发生改变。例如,Bardi等(2009)对英国大学生的价值观研究发现,尽管部分价值观因为时间的改变重要性发生

变化,但各种价值观的重要性顺序却保持相当稳定,享乐、仁慈、自我定向、成就等价值观一直是个体更看重的价值观,而遵从、传统价值观一直是最不被看重的价值观。一项对新西兰成年人价值观为期三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开放价值观、自我超越价值观以及自我增强价值观的等级秩序是非常稳定的,并且这种稳定性不受性别的影响(Milfont, Milojev, & Sibley, 2016)。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年龄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价值观的稳定性增强(Vecchione et al., 2016)。

2.1.2 跨情境的一致性

价值观的稳定性还表现在价值观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有研究者对警察学院学员的价值观进行研究,在培训初期以及九个月后分别测量学员的价值观,结果发现两次测试中学员的价值观并没有存在显著的差异,表明即使培训了九个月也没有改变个体的价值观。同样,大学生通过专业学习虽然改变了部分价值观的重要性,但价值观的排序保持稳定。商学专业学生从大一到大三进行了三次价值观测试,享乐和成就价值观都是最被看重的价值观,而普世主义、权力以及传统价值观是最不被看重的价值观(Bardi et al., 2014)。即使经历过重大生活事件,个体的价值观仍然可能表现出稳定性的特征。有研究者对在阿富汗地区执行为期6个月任务的瑞士士兵的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在他们执行任务前后分别测量价值观,结果发现,刺激、普世主义、仁慈、安全、遵从等价值观的重要性变化较小;自我定向、享乐价值观的重要性几乎无变化;且个体内部价值观的排序保持稳定(Sundberg, 2016)。Lönngqvist, Jasinskaja-Lahti 和 Verkasalo(2013)对移民的价值观研究中发现,大部分价值观的重要性保持不变,个别价值观的重要性在移民后发生改变,随后又回到移民之前的水平。且价值观排序保持稳定,不管是移民前还是移民后,普世主义、安全、仁慈都是个体最看重的价值观。

2.2 保护性价值观的稳定性

Baron 和 Spranca(1997)认为,在个体的价值观中,存在着一类特殊的价值观,人们拒绝将该价值观与其它价值观进行交易,尤其是拒绝进行经济或物质奖赏的交易,这样的价值观称为神圣价值观(Sacred Values)或者保护性价值观(Protected Values)。绝对性是保护性价值观的定义性特征,这一特征表明个体的保护性价值观具有稳定性。例如在Ginges 和 Atran(2013)的研究中,以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定居者为被试,考察“和平”与“土地”这一价值观选择,询问被试“是否同意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放弃以

色列的部分土地”,结果发现有46%的被试完全拒绝以土地换取和平,坚决维护领土完整,对这部分被试而言,领土完整是一项保护性价值观,具有绝对性。绝对性意味着无论获得多大的利益都会抵制某种行为的发生,或者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愿意坚持某种行为,行为的选择不受利益大小的影响,体现出保护性价值观的稳定性。此外,保护性价值观还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例如在Berns 等(2012)的研究中,给被试呈现保护性价值观和非保护性价值观句子,每次同时呈现两个对立的句子,要求被试从两个句子中选择一个句子。6~14个月后进行重复测试,结果发现保护性价值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并且保护性价值观比非保护性价值观的稳定性程度更高。

2.3 人生价值观的稳定性

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的内涵、过程、方式、意义、目的的价值判断和选择(黄希庭,郑涌,2005, p. 46)。从古至今,许多仁人志士的价值观在一生中保持稳定。例如,范仲淹毕生倡导并且身体力行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的价值观。“先忧后乐”是范仲淹的人生价值目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范仲淹实现人生价值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在早年求学时期生活穷苦却刻苦读书,据《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范仲淹在年轻时便有“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的志向。而在其一生仕途中所做的事情确实体现了对“先忧后乐”价值观的坚守。27岁范仲淹初入仕途,便尽心为民。据《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记载,范仲淹在广德任职期间,审理案件时不枉不纵,并且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33岁时范仲淹调任泰州,建议并主持修筑海堰。范仲淹45岁时在苏州任职,征募当地无业游民,疏通周边河道,引导河流注入大海,治理了苏州的水灾,同时兴建地方学校,重视教育。范仲淹一生中三次因为直言上谏而被贬,仍然为了国计民生而直言。正如其在《灵乌赋》中所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多次上书自己的政见。即使在居丧期间,仍然“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将自己的见解写成《上执政书》,提交给朝中大臣。后在京城做官,范仲淹更是关心国计民生,54岁时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表达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意图改善当时宋朝内忧外患的局面。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为朝廷重臣,范仲淹一生都坚持了“先忧后乐”的价值观。

虽然这些资料并不是完善的个案研究,但确实体现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一旦真正形成之后是相对稳定的。看来,很有必

要用生命叙事和心理传记学(Life Narrative and Psychobiography)来研究古今仁人志士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问题。

3 价值观的可变性

目前对于价值观可变性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种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青少年时期价值观的变化;个体自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引发价值观变化;实验干预引起的价值观变化。价值观改变其实是个体适应环境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要主动或被动改变的,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3.1 个人发展中的价值观变化

个人的价值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改变。青少年时期个体的价值观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对德国、以色列等国家的青少年价值观研究均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权力价值观、成就价值观、自我定向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而仁慈价值观、普世主义价值观、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Bardi et al., 2009)。成年早期个体的价值观也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在成年早期,个体的成就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而普世主义价值观、安全价值观、权力价值观的重要性增强(Myyry, Juujärvi, & Pessa, 2013; Vecchione et al., 2016)。在其它人生发展阶段,个体的价值观仍然可能发生变化。一项对波兰儿童价值观的研究中,连续三年测试儿童的价值观,结果发现开放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保守价值观和自我超越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Cieciuch, Davidov, & Algesheimer, 2016)。

年龄导致价值观的改变,可能是由于生理的变化。Schwartz(2005)认为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享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是因为感官的衰退,感官不如年轻人,因此对享乐的追求降低。青春期个体的生理和认知等都在发生转变。由于青少年身体外形的成熟,会更多地寻求自主性和自我主张,寻求与父母的分离来形成独立的自我。探寻新的行为选择,甚至冒险(Braams, van Duijvenvoorde, Peper, & Crone, 2015)。因此,自我增强价值观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提升。

有研究者认为年龄导致价值观的改变,其实就是适应该年龄阶段的生活环境(Schwartz, 2005),价值观的改变可能是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发展任务的结果(Gouveia, Vione, Milfont, & Fischer, 2015)。例如,成年早期个体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理想的实现和事业的发展,为了适应自身的需求和外环境,权力、成就价值观的重要性增加。成年中期,个体更多关注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因此,更重视安全、遵从和传统等价值观。

3.2 重大经历导致价值观变化

如果个体经历重大生活改变,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恐怖袭击事件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个体的价值观。研究发现,在9.11事件后,美国公民的自由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社会秩序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但恐怖袭击带来的价值观变化并非长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观又会逐渐回归到9.11事件前水平(Ciuk, 2016)。而对于长期处于政治暴力地区的个体而言,价值观的改变是持久的(Braun - Lewensohn & Sagy, 2010)。

移民也会改变个体的价值观。一项对从波兰移民到英国的被试的价值观的研究发现,在移民1年多以后,自我定向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了,而权力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了(Bardi et al., 2014)。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移民导致的价值观改变并非持续的,在移民两年后,个体的价值观又重新回归到了移民之前水平(Lönnqvist et al., 2013)。

航天员在太空飞行前后价值观也会变化。Brcic 和 Della - Rossa(2012)对加拿大航天员的多种类别采访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成就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在航天飞行期间相比飞行前显著下降,而在飞行结束后则回升。Suedfeld, Legkaia 和 Brcic(2010)对多个国家航天员的传记、采访等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普世主义价值观与权力价值观的重要性在航天飞行结束后显著提升。而成就价值观与刺激价值观的重要性在飞行结束后显著降低。

为人父母会改变个体的价值观。一项对芬兰146对夫妻的纵向研究发现初为人母时女性价值观转向保守价值观(Lönnqvist, Leikas, & Verkasalo, 2018)。教育会改变学生的价值观。一项对英国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发现,通过专业学习,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刺激、享乐、安全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而遵从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商学专业学生仅遵从从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Bardi et al., 2014)。

个体的重大经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突发事件,例如遭受暴力、恐怖袭击等,这些事件是短暂的。第二类是持久的经历,例如结婚、养育子女等人生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来适应环境。价值观的功能理论认为,价值观主要有两个功能,即指导行为和表达需求(Gouveia et al., 2015)。当个体经历重大事件后,处于新的社会或经济环境下,或扮演着新的角色,这使得个体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需求,需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来适应环境。移民在新的环境中面临与其他群体的接触,他人反移民的态度,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等新环境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移民价值观的改变。因此在移民

以后,个体的安全价值观重要性会提升,而权力价值观重要性会降低。

尽管年龄和重大经历对价值观的影响都是由于适应环境,但两者却是不同的。年龄发展面临的环境变化除了客观的外在环境外,更多的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即个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目标引领着对特定环境的关注和适应。因此,年龄引起的价值观改变是相对持久的。而重大经历改变价值观往往是被动的;很多事件是突发的、偶然的,个体在这样的情境下往往是被迫改变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改变是短暂的,一旦事件过去,或个体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会出现价值观反弹现象。

3.3 实验干预导致价值观变化

仅仅通过实验干预,也可以使个体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价值观自我对抗(value self-confrontation)是其中一种常用的干预方式。在Rokeach(1975)的研究中,对被试的价值观进行了前测,随后给予虚假的反馈,被试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组对象进行价值观对比。2个月后再对价值观进行重测,结果发现参与了价值观自我对抗的被试价值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价值观自我对抗产生的效果是比较稳定的,并不会受到反馈方式的影响(Grube, Mayton, & Ball-Rokeach, 1994)。此外,价值观自我对抗不仅会改变单一的价值观,也会对具有相同动机以及相反动机的价值观产生影响(Maio, Pakizeh, Cheung, & Rees, 2009)。

除了价值观自我对抗以外,也可以使用别的方式促使价值观发生改变。有研究者使用包括阅读文章、完成清单、写故事、写短文等4个步骤30分钟的干预,提升了被试的仁慈价值观,并且发现这种改变至少能持续4周(Arieli, Grant, & Sagiv, 2014)。此后,有研究者使用更简单的干预方式探究了价值观的可变性。例如通过观看33分钟的电影片段,显著改变了青少年的价值观,与电影主题一致的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了,而与电影主题相反的价值观的重要性降低了(Döring & Hillbrink, 2015)。还有研究者通过模拟竞争情境,通过操纵被试的胜负条件,实现了价值观的改变。结果发现在获胜条件下,保守和开放性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了(Hitlin & Civettini, 2017)。

在价值观自我对抗程序中,给被试提供他人价值观的反馈,被试将自己的价值观与他人的价值观进行比较,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某些价值观与所在群体价值观不一致时,会对自己产生不满,因而通过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来减少对自我的不满(Grube et al., 1994)。可见,价值观自我对抗程序对价值观的

改变是社会比较的结果。观看影片以及阅读文章等方式改变价值观是通过启动实现的。启动会使得一些价值观变得突出,当某种价值观变得突出时,促使个体思考这些价值观,从而改变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Döring & Hillbrink, 2015)。进行演讲、写短文等方式改变价值观是通过自我劝说实现的。人们说服自己重新评估一些价值观的重要性,使得自己公开传达的价值观与内心的想法一致,从而避免认知失调。

4 小结与展望

个体的价值观有一个形成过程,在形成之前及形成时期表现出较大的可变性,重大经历以及实验干预等都会导致价值观的改变,表现为价值观重要性的改变;个体的价值观在形成以后,基本价值观表现出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保护性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等重要价值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表现形式却是可变的。尽管前人对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4.1 个人的核心价值观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与自我有着内在联系(Brosch & Sander, 2013)。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根植于个人灵魂深处的,是与核心自我、核心人生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可能并不等同于基本价值观,在一些研究中直接使用测量基本价值观或高阶价值观的测量工具来测量个体的核心价值观(Brosch, Stussi, Desrichard, & Sander, 2018),对这些价值观的评价只能获得个体对这些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但可能并未包含个体的核心价值观。此外,保护性价值观、人生价值观也与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存在区别。保护性价值观具有道德色彩,个体不仅仅把保护性价值观看作是个人偏好,而且会泛化到其他人身,觉得其他人也应该这样做(Baron & Spranca, 1997),而核心价值观不一定具有道德色彩,是个人的主观的信念系统,尽管个人可能将外在道德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但核心价值观并不等同于基于道德和规则的保护性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是个体众多价值观的一种类型,决定了个体自身的生活方式、奋斗目标、以及整个生命意义之所在。人生价值观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部分,人生价值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但不等同于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因为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可能属于人生价值观的更高层次。也就是说,从保护性价值观、人生价值观角度探讨价值观的可变性、稳定性可能并未涉及到个人的真正的核心价值观。探讨内化于心的个人核心价值

观这个重大工程应当编制包含中国优秀文化价值观的测量工具,研究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探究内化于心的个人核心价值观,即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怎样内化为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只有弄清了何为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之后才能进一步了解它是如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4.2 研究方法的中国化

目前,价值观研究中最常使用的量表有 RVS、SVS、PVQ,这些量表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编制的。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黄希庭,郑涌,2005,p.2)。价值观根植于文化,却鲜有研究者使用基于国内实际情况编制的价值观量表对价值观进行测量,仅仅依赖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测量工具是否真的能够获得中国人价值观的特点?价值观测量中存在社会赞许问题(杨宜音,1998),被试在量表中做出的选择可能并不能反应真实的价值观,价值观有外显与内隐之分(黄希庭,2014),自陈量表只能测量出被试的外显价值观,而居于个体灵魂深处的核心价值观可能并非都是外显的。因此,仅仅使用量表可能难以探索个体真正的核心价值观。有研究者提出可以使用投射法、文献分析法以及观察法、自然实验法等方式进行价值观研究(黄希庭,郑涌,2005,p.26),这可能是今后对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一个方向。

4.3 价值观研究对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当前,不少青年热衷于网络走红、投机炒股,憧憬于轻轻松松发大财。而工作只是为了吃喝玩乐,失去了人生的奋斗目标。这部分青年的价值观出现偏差甚至扭曲,因此,进行价值观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扭曲了的价值观,要使其发生改变,转化为正确的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在形成之前以及形成时期变化很大。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在价值观形成以后,也可能发生改变。因此,对于内化的价值观也要进行强化,使得正确价值观的方向保持不变。同时正确的价值观并非僵死的,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在价值观培育过程中也要使得价值观适应时代的潮流。价值观干预方式可用于价值观教育。

通过对价值观稳定性与可变性的文献梳理,深切地认识到对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除了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合理因素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观。例如核心价值观的性质和结构是什么?核心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核心价值观的

稳定性与可变性特点是什么?此外,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不仅具有个人层面,而且还有群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因此,价值观的探讨也会涉及文化变迁、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改变等问题。这种另辟蹊径的探索将有助于讲述中国故事中的价值观。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挑战之路,但值得去尝试。

参考文献

- 黄希庭.(2014).探究人格奥秘.北京:商务印书馆.
- 黄希庭,郑涌.(2005).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杨宜音.(1998).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2),82-93.
- Arieli, S., Grant, A. M., & Sagiv, L. (2014). Convincing yourself to care about others: An intervention for enhancing benevolence valu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2(1), 15-24.
- Bardi, A., Buchanan, K. E., Goodwin, R., Slabu, L., & Robinson, M. (2014). Value stability and change during self-chosen life transitions: Self-selection versus socialization e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1), 131-147.
- Bardi, A., & Goodwin, R. (2011). The dual route to value change: Individual processes and cultural moderato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2(2), 271-287.
- Bardi, A., Lee, J. A., Hofmann-Towfigh, N., & Soutar, G. (2009). The structure of intraindividual value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5), 913-929.
- Baron, J., & Spranca, M. (1997). Protected value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0(1), 1-16.
- Berns, G. S., Bell, E., Capra, C. M., Prietula, M. J., Moore, S., Anderson, B., ... & Atran, S. (2012). The price of your soul: Neural evidence for the non-utilitarian representation of sacred valu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7(1589), 754-762.
- Braams, B. R., van Duijvenvoorde, A. C. K., Peper, J. S., & Crone, E. A. (2015).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adolescent risk-taking: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neural responses to rewards, pubertal development,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5(18), 7226-7238.
- Braun-Lewensohn, O., & Sagy, S. (2010). Sense of coherence, hope and values among adolescents under missile attacks: A longitudi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Spirituality*, 15(3), 247-260.
- Breic, J., & Della-Rossa, I. (2012). Universal values of Canadian astronauts. *Acta Astronautica*, 80, 46-51.
- Brosch, T., & Sander, D. (2013).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value-based decision-making: From core values to economic value.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7, 398.
- Brosch, T., Stussi, Y., Desrichard, O., & Sander, D. (2018).

- Not my future? Core values and the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future events.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8(3), 476 – 484.
- Cieciuch, J., Davidov, E., & Algesheimer, R. (2016). The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value structure and priorities in childhood: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Development*, 25(3), 503 – 527.
- Ciuk, D. J. (2016). Americans' value preferences pre – and post – 9/11.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7(2), 407 – 417.
- Döring, A. K., & Hillbrink, A. (2015). Brief report: Into the wild? How a film can change adolescents' valu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40, 78 – 82.
- Ginges, J., & Atran, S. (2013). Sacred values and cultural conflict. *Advances in Culture and Psychology*, 4, 273 – 301.
- Gouveia, V. V., Vione, K. C., Milfont, T. L., & Fischer, R. (2015). Patterns of value change during the life span: Some evidence from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valu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9), 1276 – 1290.
- Grube, J. W., Mayton, D. M., & Ball – Rokeach, S. J. (1994). Inducing change in valu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Belief system theory and the method of value self – confront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0(4), 153 – 173.
- Hitlin, S., & Civettini, N. (2017). The situated durability of values. In S. R. Thye & E. J. Lawler (Eds.),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pp. 175 – 198).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 Lönnqvist, J. E., Jasinskaja – Lahti, I., & Verkasalo, M. (2013). Rebound effect in personal values: Ingrian finnish migrants' values two years after migration.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44(7), 1122 – 1126.
- Lönnqvist, J. E., Leikas, S., & Verkasalo, M. (2018). Value change in men and women entering parenthood: New mothers' value priorities shift towards conservation valu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0, 47 – 51.
- Maio, G. R., Pakizeh, A., Cheung, W. Y., & Rees, K. J. (2009). Changing, priming, and acting on values: Effects via motivational relations in a circula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4), 699 – 715.
- Milfont, T. L., Milojev, P., & Sibley, C. G. (2016). Values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adulthood: A 3 – 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rank – order stability and mean – level differenc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2(5), 572 – 588.
- Myrsky, L., Juujärvi, S., & Pessa, K. (2013). Change in values and moral reasoning during higher edu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0(2), 269 – 284.
- Rokeach, M.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Free Press.
- Rokeach, M. (1975). Long – term value changes initiated by computer feedbac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3), 467 – 476.
-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pp. 1 – 65). Academic Press.
- Schwartz, S. H., Melech, G., Lehmann, A., Burgess, S., Harris, M., & Owens, V. (2001). Extending the cross – cultural validity of the theory of basic human values with a different method of measurement.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32(5), 519 – 542.
- Schwartz, S. H. (2005). Robustness and fruitfulness of a theory of universals in individual human values. In A. Tamayo & J. B. Porto (Eds.), *Valores e comportamento nas organizações* [Values and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pp. 56 – 95). Petrópolis, Brazil: Vozes.
- Suedfeld, P., Legkaia, K., & Brcic, J. (2010). Changes in the hierarchy of value re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flying in spa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5), 1411 – 1436.
- Sundberg, R. (2016). Value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an ISAF conting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4(1), 91 – 101.
- Vecchione, M., Schwartz, S., Alessandri, G., Döring, A. K., Castellani, V., & Caprara, M. G. (2016).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basic personal values in early adulthood: An 8 – 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63, 111 – 122.

Value Stability and Change

Pan Li Huang Xiting Li Shujie

(Faculty of Psych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Value is a belief system that people use to distinguish good from bad, beautiful from ugly, gain from loss, right from wrong, which is usually full of affection. Valu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Some values are stable across time and situations, especially protected values and life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as personal development, major events and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s can lead to changes in values. Proceeding from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it is the focus of our future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core values of the individual, the Sinicization of value research,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value research on value education.

Key words: values; stability; change; Sinicization of value research